

# 时空双维度中的“抢购事件谣言”研究

□ 黄 芸 胡 阳 韩昱瑞

**【摘要】**重大事件中的谣言治理始终在路上，而高效的治理往往依托准确的归因。本文以21世纪初重大灾难事故中国内影响较大的三个“抢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分析谣言传播及其造成影响的原因，继而提出针对性治理路径。研究发现，功能主义谣言研究的代表奥尔波特谣言传播公式在谣言的空间传播研究与空间治理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指导意义，但无法解释与根治此类谣言事件的反复发生；而集体记忆研究视角在触发大规模集体抢购的谣言事件中提供了溯因思路。将集体记忆的谣言研究视角与谣言传播公式结合，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解释谣言成因，推动现代化谣言的高效治理。

**【关键词】**谣言治理；奥尔波特谣言模型；集体记忆；抢购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纷飞。2020年1月31日晚，“双黄连口服液能防治肺炎病毒”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大规模集体抢购，此次事件与日本核泄漏事故中的抢盐风波，及“非典”疫情中的板蓝根抢购事件颇为相似，都是由谣言触发社会恐慌且促动了大规模集体行动。事实上，“谣言”只是一个笼统的集合名词，不同类型的谣言产生的原因不同，只有具体分析引发抢购类的谣言之后寻找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才能打破“抢购风波”的反复出现。

##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回顾：谣言研究的两个维度

根据刘海龙关于广州肺炎流言研究中的分类，20世纪初至今，西方学者对谣言的研究大致形成了线性范式、心理学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及阐释学范式。<sup>[1]</sup>事实上，上述四个研究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整合成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也被称作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研究路径。

### （一）物理空间中传播的谣言：奥尔波特谣言研究模型

1947年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等人开创了科学的谣言研究模型，二人提出的谣言传播公式成为谣言研究中最著名、沿用最广且历时最久的经典理论。该公式为 $R=I \times A$ ，即谣言的流通量（Rumor）=信息的重要性（Importance）×事

**【作者简介】**黄 芸，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胡 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昱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件模糊性 (Ambiguous)，可用于解释特定时期谣言产生 (与扩散) 的原因、传播范围以及影响规模，因其在谣言的空间传播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沿用至今。后继的研究者直接援引该公式进行谣言分析，以奥尔波特谣言传播模型为基础引入新变量的研究，从而得出新谣言传播公式。相关研究中提出的新增变量包括“公众批判能力”<sup>[2]</sup>“环境指数”<sup>[3]</sup>“信息的不对称性”<sup>[4]</sup>“传播者影响力”<sup>[5]</sup>等，以及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新影响因素<sup>[6]</sup>。国内外学者对谣言传播的研究，从信息内容本身转移到了兼顾信息、接受者与传播环境，但相关理论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首先，愈加复杂的公式限制了使用的灵活性，而多个变量的轻重之别也无法凸显；其次，后继研究者在新的案例研究中 (除奥尔波特等人提出的两个基础指标外) 并没有沿用前人新增的变量，而是引入新指标，囿于某一情境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自说自话，可见这一公式的发展是伪延续。

以上研究状况反映出理论本身的缺陷。谣言产生于社会，不同类型谣言的特殊性大多源自社会历史因素，因此，关注“当下”与“空间传播”的奥尔波特谣言公式只能应用于谣言传播的一般规律，无法细化到谣言的具体情境与类别。既然该模型的缺陷如此明显，又为何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治理”，治理是偏向空间维度的。该模型的经典变量“事件重要性”与“事件模糊性”作为可测量的治理指标，提供了较好的信息控制与社会管理思路。但

只关注谣言在物理空间中的传播问题是不够的，从时间维度看，许多后继研究者的改进也是“治标不治本”。

## (二) 跨时间传播的谣言：集体记忆研究视角

奥尔波特及其后继者的研究被称作功能主义谣言研究，其理论兴趣聚焦于对谣言的治理方面，对谣言的研究偏重于空间和人，而忽略了时间轴上的传播。事实上，抓住上述模型中经典的“重要性”与“模糊性”两个基本特点，其他因素完全可以交给时间维度的理论去分析。社会学和阐释学的研究者为这一研究添加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视角，强调社会与历史的纵向维度是谣言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荣格于1959年提出的“谣言—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认为，谣言研究要关注人类在漫长社会中形成的经验，历时性的谣言都是自远古时期深居于人们被成千上万的陈述所投射过的心智，这一理论勾连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勒莫1999年提出从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三段式谣言昆虫变态理论，借用昆虫的变态过程比喻谣言在集体中的酝酿、形成与爆发，提供了研究谣言过程及成因的方法论；还有20世纪70年代才引起学界重视的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都是集体记忆研究路径的代表性研究。<sup>[7]</sup>而李红涛认为，哈布瓦赫研究中的记忆的社会情境仅仅是集体记忆领域的研究传统之一，还有另外三种研究传统，分别是以当下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自下而上的流行记忆或民间记忆视角和记忆的动

表1 研究对象概要

背景	时间	事件	相关谣言及说明
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	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事件	专业机构消息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病毒，众多网友理解成了“可以治疗预防”，信息发布的明确性上存在不足致使专业机构“造了谣”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2011年	碘盐抢购事件	“核危机会影响海水，今后海盐也可能不健康”的谣言传出，形成集体恐慌
非典型肺炎疫情	2003年	板蓝根抢购事件	板蓝根虽在当年4月被专业机构证实有预防效果，但抢购兴起于当年2月，是疫情消息未公开之时坊间谣言所致

力机制视角。<sup>[8]</sup>这些都是功能主义谣言所欠缺的理论视角。

集体记忆的视角关注重点在公众，在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对谣言剖析得更为深入，且正好能为囿于“空间”视角的奥尔波特谣言研究模型补充“时间”的维度；另外，若要实施更有效的现代化谣言治理，更应当有时空并重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解释为何引发抢购事件的谣言会一再发生且社会影响不减，进而提出针对此类谣言的治理建议。

本文选取21世纪初国内影响较大的三个重大灾难事故中的“抢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 二、以“空间”角度的理论为分析基础的谣言治理困境

### （一）谣言的空间传播分析

谣言传播模型适用于解释谣言在物理空间中的传播。重大灾难事件中，触发抢购事件的谣言为何会产生与传播？奥尔波特等人提出的谣言传播公式 $R=I*A$ 为之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攸关性命的灾难，权威渠道无法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媒体集体失语，公众的偏差性解读，带来谣言大规模的传播，一次次的抢购行动由此而起。

从公式中的变量“ $I$ ”，即谣言传递的信息所具有的重要性看，首先，“非典”疫情、日本核泄漏事故、新冠肺炎疫情在消息传出时均属于已威胁到个体生命安全的事件，无疑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再者，由于事发突然，没有迅速而及时的医治方法，“可治疗”的消息对公众而言无疑是重要的。同时，三起灾难的影响范围都极广，“非典”与新冠肺炎都是传染性疾病，随人口流动极易扩大影响规模，而日本与中国仅一海之隔，沿海地区都在核泄漏事故的影响范围内。正是因为谣言传递的信息对公众的生存至关重要，才为谣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公式中的另一个变量“ $A$ ”即谣言传递信息

所具有的模糊性。政府、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信息流通分别对应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在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话语场中，三者的张力共同构筑着事件的拟态环境，而某一方的缺位则使得事件的模糊性显现。“非典”疫情期间，主流媒体早期的传播缺位形成巨大的信息漏洞，事件清晰度极低的情况下民间谣言便承担起补充信息拼图的“任务”；日本核泄漏期间，主流媒体并未及时引导，社交平台信息的引导与煽动使得人际传播的张力一时间“胜过”了政府与主流媒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仅仅是因为主流媒体传递的一则信息不够明确便再次引发了集体恐慌。可见，只要模糊性尚存，谣言便无孔不入。

### （二）“对症下药”的空间治理

谣言的传播力度和范围，与辟谣效率和信息透明度息息相关，信息公布的时间越早、内容越透明，谣言的模糊性就越低，平息的速度也就越快。近年来政府谣言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相关针对性举措与奥尔波特谣言模型所提及的两个指标相契合（见表2）。谣言的治理方式主要以政府澄清事件真相为主，这一举措的目的是消除事件模糊性，抑制假消息在当下的传播；而澄清的速度越快，事件的模糊性也就越低，从而更好控制谣言扩散的范围。

三个事件中谣言的澄清与治理方式各有特点。“非典”疫情期间政府疫情信息的长期空白使得关于“怪病”及其防治的谣言自在传播，也自行消散，直至疫情结束，关于“板蓝根能够治疗‘非典’”的传闻也未能得到权

表2 相关谣言的空间治理对比解读

谣言触发事件	谣言治理方式	政府辟谣时长
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自媒体与主流媒体辟谣，政府澄清（协同辟谣）	7小时
抢购碘盐	卫生部（政府）辟谣，拘留造谣者，承诺食盐供应	5天
抢购板蓝根	未进行针对性辟谣	数月

威与科学地证实或证伪，整个事件的清晰度极低。日本核泄漏事件中，政府较快地对假消息进行了澄清，除此之外，对造谣者的依法处置也会起到明确的警示作用，而承诺对食盐的供应则进一步消除了民众心中的疑虑，无论是谣言的根源、假消息本身还是未来的保证，相关治理举措使事件以高清晰度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对于新冠肺炎期间的抢购双黄连口服液事件，辟谣平台借助专业团队快速辟谣，政府的澄清紧随其后，政府、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协同辟谣，高效澄清了事实。从“非典”疫情期间对谣言的弱治理，到日本核泄漏事件中以政府为治理主体实施较为完备的治理举措，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主流媒体、专业团队进行协同治理，高效还原事件的清晰度和辟谣速度越来越快，可见谣言治理的巨大进步。

### （三）“空间”视角在谣言研究与治理中或存在不足

奥尔波特谣言模型中的两个变量“事件重要性”与“事件模糊性”，可以为谣言的空间传播治理提供较好的出路，但“唯空间传播”型的治理也存在缺陷。三个事件中的谣言类型、触发的集体行动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高度相似，是否有方法防止同类事件反复发生，从而为政府进行此类谣言治理提供出路？遗憾的是，因奥尔波特谣言传播模型关注的仅仅是谣言在空间中的传播，只可解释某一则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现象，却无法对类似谣言的反复出现作出回答。

### 三、集体记忆作为谣言传播与治理的“时间”维度

物理空间中的谣言或由政府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声音宣布为“假”，或在事件信息越来越透明之后不攻自破，但可见的是物理空间中谣言的消解，不可见的却是社会历史因素在人们的记忆里播下的同类谣言潜滋暗长、一触即发的种子。由此可以看到功能主义谣言研究强大的解释

力与一针见血的治理要害，也看到了它的盲区。因此有必要退回到“抢购”事件的导火索，以期寻找另一条阐释路径以提供针对性的治理思路。本节着重阐述三个事件的共性，也即分析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原因才会让同类谣言与之触发的同类事件起落有期。

#### （一）集体记忆作为集体恐惧的来处

通过集体记忆视角研究谣言的理论逻辑是捷思性，也即人们本能地会用唾手可得的经验与资源去理解现实情境，从而形成哪怕是强行因果的判断捷径。集体记忆研究者哈布瓦赫认为，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sup>[9]</sup>神话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在世代间传递，成为集体潜意识，进而形成社会捷思的经验存储库。所以，谣言一旦与集体记忆产生对话，不但会大规模扩散，而且所触发的社会情绪会进一步促动集体行动。

#### 1. 集体记忆之一：死亡焦虑

对死亡的恐惧是生存必需性胁迫下人类的弱点。<sup>[10]</sup>死亡焦虑被认为产生于当个体对死亡与自己以及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预期自身价值受到威胁且这种威胁无法解除之时。<sup>[11]</sup>于个体自身而言，人有自保的本能，由于无法通过亲历总结经验，死亡成为一种认识上的不可知，宗教神话中固然有极乐世界、天堂、彼岸等积极意涵，但关于“灵丹妙药”的传说、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对“长久”的歌颂等，从神话到现实皆传递了自古以来对死亡的负面定位，而现代科学传统恰恰将生与死二元对立起来，<sup>[12]</sup>加剧了这种认同。此外，于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死亡则意味着人伦未竟的遗憾。<sup>[13]</sup>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人对自身的家庭角色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儒家对“礼”的遵从恰恰是将“角色”摆在了家国治理的重要位置，而死亡则是家庭角色之丧失，成为古往今来的恨事。个体意识与家庭角色认知使得社会中弥散着死亡焦虑，这种焦虑一旦被“能够逃避死亡”的消息唤醒，便能短

时间聚集起强大的行动力量，灾难中“××能治疗××”的谣言就属于此类消息。

### 2. 集体记忆之二：世代记忆中的饥荒

世代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框架。<sup>[14]</sup>国人的世代记忆中，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成为世代中关于物质匮乏的记忆。尽管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学界莫衷一是，<sup>[15]</sup>但这一观点在社会历史的口耳相传中成为了“饥荒”的标签，而其流传甚广的原因正是世代对物质匮乏的深刻记忆。“对匮乏的恐惧”也被认为是死亡恐惧的具体表征之一，<sup>[16]</sup>如前文所述，抢购的行为来源于对物资库存不足的恐惧，“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冠肺炎（从而避免死亡）”“碘盐能够预防核辐射（从而避免死亡）”“板蓝根能够预防非典型肺炎（从而避免死亡）”等谣言正是触发了对市场存量不足的恐惧，制造了虚假的匮乏继而引发匮乏感，从而使谣言随着恐惧迅速大规模扩散，大规模的集体抢购行为便是在集体追求对“匮乏感”的补充。

### 3. 集体记忆之三：“救命稻草”们的资源属性

以食盐为例，“盐荒”虽也是一种物质的匮乏历史，却与“饥荒”不同。上述来自“饥荒”记忆的物质匮乏恐惧是同“温饱”相勾连的，而“盐荒”则是将食盐、食醋、肥皂等日用品赋予一种资源属性。自春秋时期管仲推行的“官山海”始，中国便有了盐铁官营政策；建国初期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日用品供销关系紧张；20世纪80年代开放部分农副产品零售价格的决定又触发了囤积农副产品的现象。<sup>[17]</sup>可见，作为“资源”（而非仅仅是“食物”）的商品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反复经历官民博弈，相关记忆也被循环强化，反复提及，继而延续。但凡被视作资源的物品多多少少都附着有相关集体记忆，食盐如此，中草药亦然。贫富链中下游的大众社会安全感与抗风险能力是脆弱的，外界的风声刺激着众人敏感的神经，谣言一触即发。

### 4. 集体记忆之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的俗语

以勒莫的谣言研究理论看来，上述的集体记忆形成皆属于“幼虫”阶段，或远溯至原始的人类基因，有本土文化迷思的加持，也有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幼虫”在漫长的人类社会里或蛰伏在“虫蛹”里在时间中传递，或在爆发之后随谣言进行进一步加固与孕育，继而再次蛰伏。值得一提的是，充当“虫蛹”的集体记忆载体有时是俗语，而本文所研究的“抢购”类谣言及其触发事件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俗语所承载的传统思维习惯也不无关系。这一俗语反映的社会心理被称作“错失恐惧”，即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其他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sup>[18]</sup>三个事件中抢购的人们未必全然相信谣言中所提到的“救治之方”，但“人有我无”的错失恐惧使人们追逐此类谣言，继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俗语在社会长期发展中一边传递，一边潜移默化地形塑这种方法论，形成了一种有驯化功能的集体记忆。

### （二）集体记忆的时间累积机制折射谣言治理之难

根据勒莫“幼虫—蛹—成虫”的集体记忆谣言研究理论，昆虫成长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来自社会历史的集体记忆、现实过程触发的个人记忆以及属于集体记忆表象的谣言及其传播。联系本文研究的三个抢购事件，上述四种集体记忆作为不同阶段的“幼虫”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蛰伏已久，并在漫长的时间累积中反复传染与传递；而无论是疫情还是核泄漏危机，均为此类集体记忆提供了孵化的现实条件；相关谣言一旦产生，便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开来。勒莫的谣言理论将谣言的传播视为集体记忆的表象，上文提及空间维度的传播与治理也仅仅是最后“成虫”阶段的表征与措施，而谣言研究的有效性则应追溯集体记忆漫长的时间累积机制。

与“空间”相对的“时间”维度看，本文所研究的谣言类型根植于集体无意识，如迷思般

承载着历史。当集体抢购事件被触发时,是被唤醒的集体记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集体记忆阐释谣言传播的另一面恰恰是谣言治理之难。用“时间”的维度研究谣言传播的原因,当发掘出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后,“集体遗忘”便成为了治理的重大难题。

#### 四、结论与反思:时空结合的治理之路

高效的空间治理固然难得,但发掘深层的原因才是对症下药的更好出路。因此,若要具备时空兼备的治理视角,在现有的空间治理基础上,需要对有“集体记忆”根源的谣言采取针对性措施。政府层面,首先,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更高速地辟谣、反复辟谣;其次,及时公开物资储备,人们的“匮乏感”恐惧往往来源于对市场物资存量不足的判断与担心,必需品的储备量透明化有利于缓解众人心中的惶惑不安;再者,基于同样的“匮乏感”恐惧,政府可承诺必要品的供应,如此则是告诉人们“不必抢”。长此以往,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便会习得“政府是最稳固的靠山”的认知。

媒体则须继续发扬教化的社会功能。首先,进行同类事件的旧闻对比,在公众处于理智阶段时便唤醒集体遗忘的事件,譬如,在“双黄连口服液能防治肺炎”等谣言出现之前便可防微杜渐地将以往重大灾难事件中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展现出来,起到对社会的训示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众多集体记忆源于神话与民间想象,媒体大可“讲一个故事”,将谣言的来龙去脉,包括背后可能的动机、谣言信息不正确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完整叙述;此外,不同受众定位的媒体可针对受众使用贴近他们的世界观与叙述话语去讲述“辟谣故事”,关注不同谣言对不同受众产生的情绪与心理变化,或许能够取得更好的辟谣效果。■

#### 参考文献:

- [1] 刘海龙.从广州肺炎事件看流言的传播与控制[J].国际新闻界,2003(2):38-44.
- [2] Chorus, A. "The basic law of rumor."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1953):313-314.
- [3] 吴建,马超.谣言传播公式:溯源、修正与发展[J].新闻界,2015(3):22-25.
- [4] 匡文波,郭育丰.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4-137.
- [5] 王倩,于风.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谣言传播公式的改进及其验证:基于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的新浪微博谣言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7(11):47-67.
- [6] 徐速.微博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4.
- [7] 杨慧琼.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论谣言研究之路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4(11):65-80.
- [8]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汉文版),2013(5):18-21.
- [9] 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J].社会学研究,2005(5):182-201.
- [10] 蔡昱,龚刚.从畏死的恐惧看人的境况——三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J].学术界,2019(6):64-73.
- [11] 韩兆彩,李树苗,左冬梅.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测量——基于DAQ量表的验证与分析[J].人口学刊,2017(4):82-92.
- [12] 孙林.藏族死亡观念研究[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44-51.
- [13] 郑晓江.论死亡焦虑及其消解方式[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11-18.
- [14] 杨慧琼.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论谣言研究之路径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4(11):65-80.
- [15] 程恩富,詹志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2017(2):97-111.
- [16] 蔡昱,龚刚.从畏死的恐惧看人的境况——三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J].学术界,2019(6):64-73.
- [17] 尹金凤,徐舟.谣言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象透视与本质挖掘[J].江淮论坛,2018(1):109-114.
- [18] 柴唤友,牛更枫,褚晓伟等.错失恐惧:我又错过了什么? [J].心理科学进展,2018(3):527-537.